

文艺风云书系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程光炜 著

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

—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（1949～1976）

文艺风云书系

程光炜 著

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

—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（1949～1976）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:中国当代文学研究:1949~
1976/程光炜著. —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5.4
(文艺风云书系)

ISBN 7-81091-332-8

I. 文… II. 程… III. 当代文学-文学研究-中国-
1949~1976 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3137 号

出 版 人 王刘纯
责任编辑 袁喜生
责任校对 和彩霞
责任印制 王 慧
装帧设计 张 胜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地址: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:475001
电话:0378-2864669(行管部) 0378-2825001(营销部)
网址:www.hupress.com E-mail:bangong@hupress.com

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
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50mm×960mm 1/16 印 张 14.5
字 数 210 千字
印 数 1-3000 册

ISBN 7-81091-332-8/I·238

定 价:22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导论:文学思潮与现代性	(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编 文学形象的“重构”

第一章 知识者、文化气候与本土化倾向	(19)
一 尝试“知识考古学”	(19)
二 规训与矛盾	(24)
三 想像的差异性	(29)
四 本土化的历程	(35)
第二章 农民形象的“经典化”	(40)
一 怎样对“农民”定义	(40)
二 寻求“本质化”	(45)
三 超越赵树理	(51)
第三章 英雄:走出历史的现代修辞	(59)
一 “官逼民反”的小说原义	(60)
二 英雄的型构	(63)
三 “单向度”的问题	(68)
四 如何“重进”文学史	(72)
第四章 论“反面”人物的形成	(77)
一 最初的分类	(77)
二 进入文学的经典画廊	(81)

三 人物称谓的再修改	(86)
四 命名的意义	(90)

第二编 民族国家的叙事

第五章 关于“历史”的叙事	(97)
一 客观性和能指性	(97)
二 叙事的概念	(101)
三 被简化的叙事倾向	(105)
四 全知全能的“叙事”	(108)
第六章 《红旗谱》、《红日》和《红岩》的创作策略	(114)
一 《红旗谱》：复仇与革命	(114)
二 《红日》：战争史诗的探索	(119)
三 《红岩》：关于“红色”的讲述	(123)
四 未完的话题	(127)
第七章 《青春之歌》文本的复杂性	(130)
一 创建“走向集体”的故事模式	(131)
二 《青春之歌》主题的分裂	(135)
三 从小说到电影	(140)
第八章 《林海雪原》：英雄传奇与生活虚构化	(144)
一 英雄的“传奇”	(144)
二 战场：在实与虚之间	(149)
三 改编为现代革命京剧	(153)

第三编 阅读·重现·成长

第九章 阅读与反应	(161)
一 文学工程的启动	(161)
二 另一记忆的形成	(164)
三 文学教材的制度化	(168)
四 从红卫兵运动到伤痕文学	(171)
五 怎样看待革命文学	(174)

第十章 历史文献的解密·····	(178)
一 历史的“重现”方式·····	(178)
二 陈述与记忆的缠绕·····	(182)
三 进一步“解密”的障碍·····	(185)
四 档案中的“身份”·····	(191)
第十一章 在电影中成长·····	(194)
一 60 年代的文化时尚 ·····	(194)
二 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中的游戏性 ·····	(197)
三 “反面教材”的意义·····	(200)
四 《列宁在十月》与成人仪式·····	(203)
五 寻找偶像的年代·····	(206)
附录 在两个世界之间	
——周扬与当代文学·····	(209)
主要参考文献·····	(225)

导论 文学思潮与现代性

如果较为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,它实际上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。首先是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,它扭转了从《诗经》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,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性特征;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,它在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,但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“五四”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,而转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。我们这里所说的“十七年文学”的当代文学,实际上是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、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。它的发展方向、文学原则和政策,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,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,早在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,发表了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从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“十七年文学”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。但值得指出的是,虽然“五四”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,然而在“文学接受”的方式上,又有着显著差别: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,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,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,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。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,因而“批判”和“论争”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,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

作品的影响。

本文无意对“五四”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,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。它感兴趣的是居于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“批判理论”,这种理论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怎样一种关系;思潮“传播者”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,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“十七年文学”中的;“十七年文学”主要概念中的“左翼”特征,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作用,等等。

一 “批判理论”与现代性问题

有人把“十七年文学”概括为“战歌”和“颂歌”的文学,其根据就在于它对“旧社会”和“旧文化”所持有的批判色彩。实际上,“批判理论”正是左翼文学思潮中的“核心理论”。“批判理论”在其特定意义上,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。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,在整合了精神分析、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,扩充为对现代社会,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。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,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。但广义的批判理论,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、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。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,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,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、哲学的分析,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,弗洛伊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,海德格尔对“存在”的研究和对“技术”的敌意等,都属于“批判理论”的家族成员。马克思主义与“批判理论”的主要区别,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,而且还将它直接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。而这,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一个主要结合点。

从晚清到辛亥革命,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初步完成了由“传统”向“现代”的转型。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,开始了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。但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、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,却导致了知识分子“富国强民”理想(实际就是“现代化”)的普遍幻灭。

对“现代化”的失望,使左翼文学在历史关口与批判“封建传统”的“五四”文学和批判“资本主义”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汇合,从而形成了以“反现代性”为出发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“批判理论”。“反封”与“反资”并举,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。郭沫若曾对鲁迅进行过否定性评价,认为他是“封建余孽”,是“二重的反革命”。^①冯乃超把“五四”以后的大部分作家都划入“小资产阶级”的行列,指出,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,在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,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。他们的历史的任务,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。30年代,周扬在其《论〈雷雨〉和〈日出〉》中,始终紧扣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主题,他看周萍,看出的是“他的血管里正流着他父亲的血统,他的性格里也有封建的性质”。^②40年代初,当高层领导者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学的“现状”时,注意吸收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某些思想资源。他指出:“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,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。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,就是这种东西。直到今天,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。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,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。”^③50、60年代,又将清除这些“毒草”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。直到“文革”前夕,还在关于文艺问题的“两个批示”中,提醒人们注意“封建主义”和“资产阶级”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,号召对它们做坚决的斗争。他指责说,“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,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”,这是因为“十五年来,基本上(不是一切人)不执行党的政策,做官当老爷,不去接近工农兵,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”所导致的,“最近几年,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

· 戟戟 ·

① 杜荃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,《创造月刊》第2卷第1期,1928年8月。

② 《周扬文集》第1卷,第201、202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年。

③ 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3卷,第855页,人民出版社,1991年。

缘”。^① 到 60 年代中期,左翼文学思潮对“封建主义”和“资产阶级”的批判性的认识,以及这种认识对“十七年文学”的渗透性影响,发展到了—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。

穆尔认为,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、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。在这里,他把“现代性”与“西方性”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。富永健一是从“东亚文化”的语境中来认识现代性的。他说:“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,就是通过—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、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,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—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。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。”虽然他不认为“非西方后发展社会”的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,却承认“现代化”的内部是存在着“科学革命(现代科学和技术)、市民革命(民主政治)、产业革命(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)”这样的“西方标准”的。^② 但是,阿维内里警告说,“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,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‘分裂的现代化’深表怀疑。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,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,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”,从而出现了“非欧洲社会”的那种“错层式的现代化”。^③

如果深入到“十七年文学”内部,会发现,左翼文学的“批判理论”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。也可以说有某种“分裂”和“错层”的现象。比如,建国初期一些人曾对建立现代化“国家”(国家工业化)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,然而又对“资产阶级文化”和“中国封建主义文化”保持着—定的警觉。可以注意到,在诸多有

→ 18 18

① 参见刘景荣、袁喜生《毛泽东文艺年谱》,第 287、301 页,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2 年。

② 富永健—《“现代化理论”今日之课题——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》,《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》,第 112、119、120 页,上海译文出版社,1993 年。

③ 什洛莫·阿维内里《马克思与现代化》,《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》,第 23 页,上海译文出版社,1993 年。

影响的评说中,周扬一直在沿用和发展上述观点。例如,他把“社会主义建设”(国家工业化进程)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“资产阶级文艺思想”严格地加以区分,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“纯洁性”,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“歌颂”和“表现”,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。

很长一个时期内,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、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,成为“十七年文学”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“规律”: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,曾鼓励广大作家用“新的主题、新的人物、新的语言和形式”去表现新的时代,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《武训传》和“萧也牧创作倾向”的批判;1953年秋,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“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”,但仅过去半年,就改变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,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视为异类;“双百方针”的实施还只是起步,急风骤雨式的“反右运动”便接踵而来;60年代初,文艺界的“纠左”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,然而,“两个批示”的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更为困难的境况当中。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“城市化”表现出羡慕与向往、“命运”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——小说《我们夫妇之间》和话剧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。《我们夫妇之间》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的副刊《人民文艺》上。小说告诉读者,进城之后,革命者“我”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,丈夫感受到都市“强烈的诱惑”,而妻子却反应木然,变得愈加“狭隘、保守、固执”。在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,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“哨兵”作为“对立面”出现在人们面前,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。与《霓》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,《我们夫妇之间》被指责为“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、趣味来观察生活,表现生活”,“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”,反映了在进城

之后,“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”的不良倾向。^①从农村进入城市,曾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,而在“十七年文学”创作中,“城市化”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,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学命题。

物质的“现代化”与精神的“纯洁化”之所以构成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“分裂性”主题,实际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阶段后,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困惑。它在世界性的左翼文学现象中,也很难说不带有某种普遍性。值得追问的是问题:既然左翼文学是中国“现代”文学的一个分支,那么它为什么却把“反现代性”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之上?并把它确定为“十七年文学”的审美理想?左翼文学思潮究其根源,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,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,既然要实现国家的“现代化”,为什么却把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市民革命(消费性、娱乐性)、产业革命(资本主义化)等等,冠以资产阶级“腐朽性”、“小资情绪”等含有歧视性和等级性的命名呢?显然,以此思路观察“十七年文学”的发展历程,“战歌”与“颂歌”显然不只代表着它基本的审美特征,还深刻蕴涵着某种“断裂”的“不协调”的声音。在这里,“批判理论”恰恰反映了批判者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焦虑,它构成了对并非“莺歌燕舞”的文学现实的一种巧妙的遮蔽。

二 思潮“传播者”的社会身份及其表现

左翼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,并发展为“十七年文学”的思想主脉,有其复杂原因。但是,“传播者”兼“实践者”的社会身份所导致的人生选择和文化选择,又为人们的研究,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野。为便于说明问题,现列出下面表格:

^① 陈涌《也谈“生活平淡”与追求“轰轰烈烈”》,1951年4月7日《光明日报》“文学评论”副刊;李定中(冯雪峰)《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,反对新的低级趣味》,《文艺报》第4卷第5期,1951年6月20日。

姓名	出生时间	籍贯	出身	学历与经历
郭沫若	1892年	四川乐山县	中等地主兼商人	留学日本,1923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。创造社主要发起人。回国后没有正式职业,以文艺创作为生。1926年,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,3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。1949年后,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、人大副委员长、中国科学院院长、中国文联主席等职。
成仿吾	1897年	湖南新化		留学日本,1921年入东京大学,专业为军械制造。创造社主要成员。职业一直不固定。参加过长征。延安时期任陕北公学校长。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东北师大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。
田汉	1898年	湖南长沙	农民	留学日本,1922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。创造社主要发起人。回国后,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。解放后,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。
钱杏邨	1900年	安徽芜湖		20年代在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就读。太阳社发起人。没有正式职业,以文艺批评为生。1930年参加“左联”。建国后,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、华北文联主席。
李初梨	1900年	四川江津		留学日本,192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。后期创造社骨干。没有固定职业。1930年参加“左联”。1948年后,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、中联部副部长。
茅盾	1896年	浙江桐乡	中等商人	北大预科肄业。1916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,长期任普通职员。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之一。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及批评。解放后,任文化部部长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。
蒋光慈	1901年	安徽霍丘	小商人	1927年入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,学习政治经济学。发起太阳社。无正式职业,以文艺创作为生。

续 表

胡风	1902年	湖北蕲春	农民	1925年进北大预科,次年进清华大学英文系,均未完成学业。1931年留学日本,入庆应大学英文系,两年后因从事普罗活动被驱逐回国。一直没有固定职业,主要编刊物和从事文艺批评。1954年,因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案”蒙难。
瞿秋白	1899年	江苏武进	破落官绅	1917年入北平俄文专修馆。1931年起,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。在苏区受到排挤,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。
冯雪峰	1907年	浙江义乌	农民	1921年,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。一度在北大旁听。1930年,受命筹备“左联”。无正式职业,以批评、翻译活动为生。新中国成立后,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、《文艺报》主编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后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。
周扬	1908年	湖南益阳	地主	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,同年留学日本。1930年辍学回国,参加“左联”。无正式职业,以文艺批评、翻译为生。抗战开始后去延安,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、鲁艺副院长。建国后,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、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张光年	1913年	湖北光化		1932年,入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。毕业后生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。1939年去延安。解放后,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副主席等职。
邵荃麟	1906年	浙江慈溪		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。无正式职业,长期从事左翼文艺活动。1953年起,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 말씀
赵树理	1906年	山西沁水	农民	1925年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。失业后,曾一度流浪。做过小学教员。1937年参加革命。建国后,任《曲艺》主编、《人民文学》编委、全国文联委员、作家协会理事。
柳青	1916年	陕西吴堡	农民	1934年入陕西西安中学。1938年去延安。1952~1966年在陕西长安县长期安家落户,任县委副书记。

续 表

郭小川	1919年	河北丰宁	教师	抗战前夕,随父母逃亡北平。中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。1937年去延安,曾在马列学院学习。1954年起,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,后被撤职。
贺敬之	1924年	山东峰县	农民	抗战爆发后,随所读中学流亡湖北、四川。1942年去延安。50年代初,在戏剧部门担任编辑和领导工作。80年代,任中宣部副部长。
李 準	1928年	河南洛阳	农民	50年代初参加工作,后回乡务农。成名后到河南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。
浩然	1932年	天津宝坻	农民	50、60年代任农村基层干部。“文革”中,任北京市文联主要负责人。
姚文元	1931年	浙江诸暨	作家兼书商	中学毕业。解放后,曾长期在上海卢湾区、《解放日报》任职。“文革”中发迹,在北京担任要职。
李希凡		北京通州		50年代就读于山东大学。因“批判”红学家俞平伯受到毛泽东欣赏,毕业后到北京工作。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。

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,20~7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主要是两类人:一是20、30年代的日本留学生,曾受到晚清革命思想、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社会思潮极深的影响。归国后,他们与另一批由破败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青年汇合,通过上海这个新文化中心,把左翼激进思潮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城乡;一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和解放后培养的工农作者,他们人生的选择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某种“同步性”,在他们身上,折射出左翼文学思潮的本土化走势和文化心理特征。

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大多来自中国的中、下等社会阶层,诸如

“中等地主兼商人”、“破落官绅”、“中小商人”和“农民”等家庭。20世纪上半叶,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急剧动荡之中,社会的中、下阶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受害者,这一“人生境况”对这些左翼作家们性格气质的发展和思想定型产生了极大影响。由于“家道中落”,茅盾1916年不得不中断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业,入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位普通译员。田汉在长沙读师范时,他母亲在丧葬用品店扎过“喜花”,在织布厂当过“过纬纱、打锭子”的临时工,摆过茶摊子、杂货铺,“母亲这种挣扎自立、为儿子牺牲的精神,使懂事的田汉又感激又难过,给他心灵上的撞击是沉重的”。^①因无家庭资助,钱杏邨、蒋光慈一直在经济拮据的状态中从事文艺创作和批评。据周扬夫人回忆,30年代的“周扬除工作外,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‘找钱’。我们‘借’过许多同志的钱,如章汉夫、夏衍、羊枣、谭林通、梅雨(梅益)、林林等,向沙汀、周立波借的更经常”,“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,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”。^②选择左翼文学立场,并不是出身寒微、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必然和惟一的选择,某些与他们经历相同而加入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青年,如沈从文、废名等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道路——但这种人生“境遇”确实容易与抨击现代社会、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化思想不谋而合,在心灵的深层次上产生孤愤、失衡、反抗的心理和社会情绪,与它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。

从该表提供的情况,还可以看出:

一、不仅社会职业、经济收入,而且作家的地域范围也需要纳入研究的视野。在统计的21人中,除茅盾一人外,郭沫若、成仿吾、田汉、钱杏邨、李初梨、茅盾、蒋光慈、胡风、冯雪峰、瞿秋白、周扬、邵荃麟基本都是回国后失业,临时在大学兼课;或在一些办办停停的刊物做编辑,写点文章,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来源,生活经常处于窘迫和飘零之中;张光年、郭小川、贺敬之、柳青、赵树理、李準、浩然、姚文元、李希凡,有的开始文学创作时是流亡学生和青年,有的童年在贫

① 董健《田汉传》,第67页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6年。

② 袁鹰、王蒙编《忆周扬》,第59页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98年。

寒中度过,有的直到解放后才有了工作,考上了大学。20~40年代,是中国现代化“受挫”进而因异族侵略产生“危机”的时期,缺乏宽裕、稳定的生活,紧张而冒险的经历,使之对社会、人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与体验更进了一步,他们的文学意识、文学创作逐步向着重实践而轻幻想,厚本土而薄西化,崇集体而忽视个体的倾向发展和倾斜。这种倾向,在解放后更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而走入了深层和体制化。另外,入表作家的地域还表现出由现代化起步较早的沿海、长江流域,向传统、闭塞和落后的内地,例如从浙江、江苏、四川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向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等地转移的趋势,这与中国革命从南方转移到北方、由摒弃西方化而转向民族化的历史趋向和选择是一致的。而这种“转移”,正好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“本土化”和“传统化”的变化。

二、这些出身社会中下层,实际也从未真正有过“学院”和“书斋”体验的作家,对中上层社会抱的是敌视的态度。当时代激流涌来时,它便容易作出告别都市走向乡村、告别个性而选择大众、告别幻想而投身革命的抉择。郭沫若、成仿吾和茅盾曾有投身北伐革命的经历,其他30年代作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共产党的,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后来也都有过“参军”、“土改”的人生实践。在他们的作品中,上层人物、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与“腐败堕落”、“风花雪月”和“资产阶级”等说法联系在一起,相反,下层的工农和士兵则成为被歌颂、赞美的对象。这也决定了,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解放后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后,仍然会按照此类社会情绪、思想模式来制订和执行符合这一标准的文艺政策与管理方式。

三、这批作家中,年轻的一代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,资深的一代虽然留学日本,或上过大学,所学专业却是医学、工科、英语、俄语、政治经济学等“实用”的学科,这些学科不属于文、史、哲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。这使他们在与社会实践结合时,往往采取一种“实用”、“直接”、“迅速”等急功近利的态度。也使他们不那么满足“边缘”,而向往和羡慕“中心”的文化地位,对文化“霸权”和语言“强势”产生浓厚兴趣。比如,在“革命文学”论争中,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钱